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文化意義與 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李嘉曾*

一、引言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開創了人類社會發展新紀元，70年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長足發展反映了這場勝利的深遠意義。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全方位的，首先是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的勝利，進而也導致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與變革。與此同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還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值此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撫今思昔，認真總結這場世界性大戰對於人類精神文明的影響，探究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文化價值，當為一件頗有意義的事。

概言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從批判戰爭發動國的精神支柱、否定法西斯戰爭理念兩個方面體現出文化意義，進而印證了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二、對法西斯戰爭精神支柱的批判

以德國、意大利、日本為首的軸心國陣營發動法西斯侵略戰爭，經濟和政治因素是主要原因。然而，這幾個國家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之所以能夠動員起千千萬萬國民，組成浩浩蕩蕩的強悍大軍，發動規模空前的世界性戰爭，精神因素不可或缺。意大利、德國和日本這三個法西斯戰爭的主要發動國，在戰前即分別通過推行、宣揚與灌輸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蠱惑了民眾的思想，構建了軍事侵略的精神支柱，為發動法西斯侵略戰爭奠定了思想基礎。

(一) 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

1. 法西斯主義

在軸心國陣營中，意大利最先找到推行激進主義的政治手段和蠱惑民眾的精神鴉片——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的特色是以極權主義的方式由國家控制所有層面的生活：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法西斯國家管理並控制生產工具。法西斯主義將民族、國家、種族的地位置於個人、制度、組織之上……並要求對單一的領袖效忠——通常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¹ “墨索里尼於1919年擬定了法西斯黨最初的黨綱”，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體現獨裁主義本質的學說。”² 正是在法西斯主義的迷惑下，墨索里尼得以在1922年10月28日動員約5萬名身穿黑衫的法西斯武裝分子開進首都羅馬，逼迫總理辭職，第二天他便如願地被國王任命組閣，此後佔據意大利王國首相的位置長達21年。

1922-1943年間，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長期推行法西斯主義(意大利語fascismo)。從政治上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獨裁主義的路綫方針；而從哲學上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形式的軍國主義、反無政府主義、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³ 這樣一種大雜燴式的混亂思想，在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很強的蠱惑力。無產階級革命家、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托洛茨基在其著作《法西斯主義——它是甚麼？如何來對付它？》一文中曾經深刻地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

*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澳門文化產業研究所所長

礎：“法西斯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生嚴重的體制危機的產物，在這個危機中，正常的資本增值，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條件下，正漸增地被破壞。在經濟和各政治機構發生這個危機的同時，在失去社會地位的社會層份中間，主要是在小資產階級中間，有正在激進化的不滿分子，以及他們的日益增多以新形式群眾組織出現的組織。起初這些組織的活動是自發的，後來它們就漸增地被大企業利用來企圖破壞工會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對於法西斯主義而言，其真正的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在意大利，它有着非常龐大的根基——城鎮小資產階級和農民”⁴，因此，大量意大利民眾捲入法西斯戰爭是不足為奇的。

2. 納粹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希特勒在德國宣揚和推行納粹主義。納粹主義的本意是“民族社會主義”，其基本理論包括宣揚種族優秀論，認為“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國家整體意志的代表，國家權力應由其一掌握；主張以戰爭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同時也反對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制度。

“納粹主義並非一嚴格定義的意識形態，而是納粹黨所奉行的國家統治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觀點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極端思想：種族主義、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神學主義、反猶太主義、反同性戀以及限制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宗教自由。”⁵它具有與法西斯主義類似的雜燴性質，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20世紀20、30年代之交經濟危機爆發的德國，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因為“納粹黨運動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城鄉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工人”，而小資產階級又佔據德國總人口數的40%以上。德國工人運動著名領袖蔡特金曾經指出貧困化的小資產階級、小農和知識分子投入納粹陣營的原因：希特勒正是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對共和制感到失望”的時機，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憧憬遊說大批“社會上喪失立足之地的人、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和失望的人，其中也包括使資本主義社會極不舒服、對它相當危險的人”⁶，最終將他們拉進了自己的陣營。

3. 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12世紀開始的幕府戰國時代即逐漸形成武士道精神，初期強調“忠孝”、“武勇”等信條，尚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明治維新以後，隨着日本逐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特別是19世紀末期日本憲法確立神道教的法律地位以後，武士道精神逐漸被統治者蛻變為控制國民思想的工具，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動力。

20世紀初就有一些中外學者，包括中國學者戴季陶、蔣百里、周作人等，對武士道精神的本質作出過深刻的評析。戴季陶認為“武士道最初的事實只不過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祿報恩主義”；周作人認為“武士的行為，無論在小說和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蓋不住一個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⁷等。不可否認，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堪稱根深蒂固，這種精神“經過長期的歷史浸潤已經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歷史上，武士道既是‘殺人與戰爭之道’，又是‘忠誠與獻身之道’”⁸，無疑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網羅民眾充當侵略戰爭炮灰的得力思想武器。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批判作用

綜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意大利、德國和日本三個軸心國的統治者正是憑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蠱惑了民眾的思想，構建了發動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他們妄圖裹脅本國國民，盲從他們發動侵略戰爭，一舉征服全世界。

然而，歷史的辯證法無情，各國人民風起雲湧的抵抗阻遏了侵略者吞併世界的勢頭，也粉碎了戰爭狂人的黃粱美夢。誠然，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來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涉及面空前廣泛。儘管學術界對於二戰的起點、性質等有着不盡相同的觀點，但這場戰爭，特別是其後期的反法西斯性質，則已經形成共識。1941年11月，德國軍隊佔領的蘇聯領土超過150萬平方公里，控制了蘇聯的40%人口與大部分工業基地。同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襲珍珠港，使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遭受毀滅性打擊。接着美、英、中三國向日本宣戰，德國和意大利也向美國宣戰，太平洋

戰爭全面爆發。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高潮，德、日、意三國因一時得逞而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曾幾何時，歷史發生了逆轉。毛澤東主席於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突破德軍包圍圈後的 1942 年 10 月 12 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社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文中科學而準確地預言：“斯大林格勒一戰將停止德國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是帶着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係於整個世界戰爭的”；“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崙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而“這一形勢，將直接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⁹此後的戰事確實是按照毛澤東的預言發展的，直至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

事實勝於雄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與結果給全世界人民，包括作為被侵略者和勝利者的同盟國人民，也包括作為侵略者和失敗者的軸心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實踐證明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都是無稽之談和精神鴉片，用它們來蠱惑民眾、發動侵略戰爭，是註定要失敗的。總之，同盟國陣營最終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不僅從軍事上徹底摧毀了軸心國的反動力量，在政治上有效遏制了法西斯制度的擴散蔓延，而且從文化的角度深刻批判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的反動本質，粉碎了發動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

三、對法西斯戰爭理念的否定

理念是人們思想觀念的總和，是對待客觀事物的總看法和從事某種活動的指導思想。人們對於不同事物總會有不同看法，不同階級、階層、集團的人們，對同一事物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從事活動也會有不同的指導思想，從而體現出不同的理念。發動戰爭的指導思想和對待戰爭的評價同樣如此。在軸心國發動法西斯戰爭以及同盟國與世界人民反對和最終戰勝法西斯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出交戰的雙方在戰爭理念上的根本對立。只要對德、日、意三國發動戰爭的藉口、表現出的戰爭行為，以及推進戰爭的運作機制稍作考

察，其反動本質便暴露無遺。而面對着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侵略戰爭，被侵略國家和民族針鋒相對地進行抵抗，實際上正是對法西斯戰爭理念作出了堅決的否定。

(一) 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否定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

從戰爭動員看。德、意、日三國均以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作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蒙蔽和鼓動本國、本民族的民眾充當炮灰。根據極端民族主義的核心理念，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鼓吹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不僅歧視別的民族，而且不惜用暴力手段殘害其他民族的人民，剝奪其他民族的生存權利。在國際關係中，則以沙文主義的狂熱姿態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甚至不惜發動侵略戰爭併吞別國領土。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侵略，日本皇軍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和殘殺等等，都是眾所周知的典型例證。

相形之下，當被侵略國家遭受法西斯勢力的入侵時，民族存亡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派別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就會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便是例證。儘管國共兩黨存在着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旦面臨日寇的大肆入侵，便形成了“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的狀況。“不再是少數仁人志士的匹夫之勇，也不再是部分群眾或部分軍隊的局部抵抗，而是全國上下、各黨各派、各階級階層、軍隊和人民、政府和群眾的總動員，是反擊日本侵略者的總體戰。”¹⁰面對着愛國主義的大旗，極端民族主義只能相形見絀而無地自容。

與此同時，在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態度上，法西斯集團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並非所有人都信奉沙文主義。身為德國納粹黨黨員的商人約翰·拉貝，1937 至 1938 年間在侵華日軍實施大屠殺的南京，聯絡十多位外國傳教士、商人、教授、醫生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親自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利用自己的住所收容了超過 600 位難民。“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

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¹¹他記述在華見聞的《拉貝日記》也成為揭露法西斯罪行的鐵證。同樣是納粹黨黨員的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為營救即將遭受屠殺的猶太人，以自己企業僱工的名義開出名單，讓這些猶太人從集中營轉移到波蘭南部的一個工廠，終於使超過1,200名猶太同胞倖免於難，“佔波蘭全部存活猶太人數量的半左右”。¹²從拉貝和辛德勒身上，我們看到國際主義的精神在閃閃發光。儘管這兩位傑出的國際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和戰後都十分艱辛，但他們的事蹟已經載入史冊，並且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極端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反動理念。

(二) 以人道主義否定非人道主義

從戰爭行為看。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在發動侵略戰爭的過程中，普遍採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對待被侵略國家的軍民。德國在二戰期間屠殺了六百餘萬猶太人，僅在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有110萬難民被害，毒氣室、焚屍爐等慘無人道的罪行令人髮指。意大利軍隊在攻佔衣索比亞時也使用毒氣，在非洲和巴爾幹半島濫殺無辜。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和東南亞更是大開殺戒，無惡不作。南京大屠殺、731細菌部隊活體試驗、強征慰安婦等慘絕人寰的罪行，都充分體現了法西斯戰爭發動者非人道的獸性本質。儘管德國、日本與意大利侵略者在迫害和殘殺被侵略國家人民時採取的手段略有不同，但是其非人道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的。有學者指出：“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有着許多的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在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犯下了無數傷天害理的罪惡；對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包括無休止的侵略、大規模的屠殺、強姦、縱火、掠奪，死在他們手中的無辜者數以千萬計，他們給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在這些方面，德日法西斯的罪行以及他們施行罪惡的手段都是相同的。”¹³

在對待戰俘的問題上尤其能夠體現戰爭理念。德國軍隊對待蘇軍戰俘的慘無人道是臭名昭著的，德軍14-80242號命令強調：“蘇聯戰俘均應做特殊的、永久性的標記”；“標記由一個開放式45度左右的銳

角構成。兩邊邊長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於左臀部離股溝約一掌寬處。可用各部隊都有手術刀來做，並可用墨汁作為染色劑”¹⁴，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盟國一方的人道主義行為。早在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後不久，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簽發了《關於對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其中明確規定：“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¹⁵儘管有一些八路軍官兵不理解甚至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認真執行了這些命令，使日軍戰俘深受感動。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接受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阪參三的建議，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日本工農學校”，專供日本戰俘學習培訓。其中不少學員後來轉變了思想，自願加入八路軍，成長為捍衛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戰士。

(三) 以民主主義否定專制極權主義

從戰爭的運作機制和指揮系統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無論是意大利、德國還是日本，都通過各種手段實現了獨裁的政治制度。墨索里尼早在1928年就強行中止議會制度，取締其他政黨和社會團體，實行法西斯獨裁。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時期獨攬大權的野心尚受到殘存魏瑪共和國議會民主制的制約，以後他千方百計通過《授權法》，消除了“民主制的最後殘餘”，策劃國會縱火案等事件實施白色恐怖，最終確立了法西斯的獨裁統治。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團體發動武裝政變，殺害首相犬養毅，終結政黨內閣，實行以軍部為主導的舉國一致內閣，實際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的道路，至東條英機擔任首相時達到頂峰。法西斯獨裁的體制極大地方便了戰爭狂人發動和指揮法西斯侵略戰爭持續進行。

作為法西斯戰爭發動者的對立面，同盟國的表現與軸心國形成鮮明對比。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重申贊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強調成員之間的團結合作。宣言中特別指出：“保證運用

軍事和經濟的全部資源同與之處於戰爭狀態的軸心國及其僕從國家作戰”；“相互合作，不與敵國單獨締結停戰協定和和約。”¹⁶ 這些原則以及宣言形成過程中的協商一致體現了民主主義的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因此“宣言的簽署標誌着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性因素。”¹⁷

一些同盟國內部同樣如此。在遠東戰場，大敵當前促使四萬萬中華兒女同仇敵愾，以人民戰爭的形式對付入侵的頑敵。為了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努力也值得肯定。1938年9-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擴大的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其中第19條規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體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後來在七大通過的黨章中把“全黨服從中央”改為“黨員個人必須服從所屬黨的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進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論與政策。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不僅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科學化，而且增強了作戰指揮的有效性，為戰場上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也是以民主主義的實踐有力地批判了法西斯專制極權主義的戰爭理念。

綜上所述，面對着軸心國發動法西斯戰爭體現的戰爭理念，同盟國和世界人民針鋒相對，在軍事上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過程，也是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否定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以人道主義否定非人道主義，以民主主義否定極權主義的過程，體現出崇高的文化價值。

四、戰後歷史印證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之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戰後重建家園的基礎上，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致力於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來，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的特徵日益明顯，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而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文化的歷史意義日益彰顯，體現出深刻的時

代價值。

習近平曾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作出高度概括，要求“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¹⁸ 戰後70年的實踐印證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

（一）講仁愛

“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所在。“儒家仁愛思想的經典語錄是孟子所言的‘仁者愛人’。這一表述體現了仁愛的實踐準則。”¹⁹ 孔子則從人際關係的角度提出了仁愛的另一種實踐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正是從“愛人”和“不欲勿施”這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切入，貫徹仁愛思想的。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在迅速變化，但人們的價值觀卻在逐漸趨同。正如鄧小平做出的高度概括：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在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下，仁愛的意義日漸彰顯，講仁愛的風尚日益推廣普及。孔子宣導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愛原則，早已成為廣為認同的普世價值。1948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1993年9月世界宗教會議通過《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理論基礎，將“珍愛生命”、“互敬互愛”等定為“不可取消的規則”，表明戰後的世界已經普遍接受了仁愛思想。

（二）重民本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礎，不僅為歷代統治者所崇尚，而且體現了封建社會朝野認可的價值觀。毛澤東曾用精闢的語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概括了新形勢下民本主義的實質，也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真諦。中華文化的民本思想同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在強調人的地位與作用、關注人的價值、命運和生存意義等方面不謀而合。

1945年7月26日，在德國納粹已經投降、日本侵略軍即將徹底潰敗、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前夕，中、美、英三國首腦於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聯合發表《中美

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簡稱《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公告除敦促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外,還對戰後日本的生存狀態與發展趨勢作出規範。公告第10條明確指出:“日本政府必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²⁰這裏已清晰地體現了同盟國領導人的民本思想,為二戰以後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了有效的安排。戰後70年來,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上對民選制度的重視和對民眾權利的尊重,進一步體現了民本思想的大勢所趨和深入人心。

(三) 守誠信

“誠信”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天道(自然規律)和人造(人際關係)的理解與概括。天道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而誠信則是用天道來規範人造,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反法西斯戰爭後期,中國遠征軍在中、緬、印戰場浴血奮戰三年多的英勇事蹟堪稱中華民族講究誠信、遵守諾言的典範。鑒於滇緬公路對於遠東戰場的重要戰略價值以及英國在軍事上的力不從心,1941年12月,英國同中國簽署《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兩國結成軍事同盟。此後中方遵守協定,組建中華民國遠征軍,在三年又三個月的艱難歲月中,投入40萬兵力,展開中緬印大戰,在傷亡近半數的情況下奮力堅持,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孫立人、戴安瀾等將軍為代表的中國軍人以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也彰顯了中華文化的誠信傳統。

相形之下,法西斯國家在發動世界大戰的過程中,背信棄義、造謠撞騙是家常便飯。德國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依然生效的前提下突襲蘇聯,日本不對美宣戰即偷襲珍珠港等事件,都是鐵證。即使在戰敗以後,有些人還不思悔改甚至變本加厲欺騙世人。德國和日本在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上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現。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給世界人民的誠信觀上了生動的一課。

(四) 崇正義

“正義”是中國傳統文化宣導的行為規範。

“正”包含“正當”、“合適”的意思,所以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征途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湧現出無數“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體現了正義無國界的真理。

在正義面前,一切貪污腐敗都將相形見绌,原形畢露。二戰後,由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家組建的刑事警察新組織,雖然沿用“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的原名(1956年更名為“國際刑警組織”,ICPO),但在國際社會發揮了更為出色的作用,在協助各國追捕逃犯、打擊國際性犯罪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僅在2014年,ICPO“共簽發了10,718個紅色通緝令,2,336人因紅色通緝令被捕”。²¹2005年12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生效,開啟了國際合作防範腐敗和懲處罪惡的新征程。2014年北京APEC會議期間,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連暫時未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都簽署了這一反腐宣言。據統計,就中國而言,“自2000年以來,已有11個外逃的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國”,其中包括2004年4月從美國被遣返的貪污挪用達4.82億美元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他是“新中國成立56年來自美國遣返的第一個貪官,也是新中國成立56年來的第一大貪官。”²²這些事實不僅顯示了國際反貪腐犯罪的有效機制,也體現了中華正義觀的無窮威力。

(五) 尚和合、求大同

“和合”與“大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矢志追求的理想目標。“天人合一”的大和諧觀正是對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高度概括。在崇尚和合的過程中,炎黃子孫又總是在追尋經由和合達到大同的有效途徑。“從《詩經》中的‘樂土、樂國’,農家的‘並耕而食’,道家的‘小國寡民’,直至儒家的‘大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理想目標的不懈追求。陶淵明憧憬的桃源幻境撲朔迷離,康有為嚮往的大同世界虛無縹緲,而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代表孫中山心中,大同理想具備了更多的積極意義,為了實現‘天下為公’的這一理想,他主

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²³ 20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捐棄前嫌，重啟談判，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實現兩岸合作、民族復興的有效途徑。可見和合與大同的優良傳統正在被當代中國人共同傳承而發揚光大。

數千年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始終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醞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即宣告成立的聯合國，堪稱世界人民追求大同的有效嘗試。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190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作為聯合國發起國和五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高興地看到，戰後70年來，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廣泛，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歷史表明，人類追尋和合大同理想境界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

1988年1月，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會上，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197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鄭重指出：“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²⁴ 戰後70年的歷史彰顯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文化意義，也雄辯地證明瞭中華文化與時俱進的時代價值。

註釋：

- 1 “法西斯主義”，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
- 2 [美]羅伯特·E·勒納等：《西方文明史》，王覺非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25頁。
- 3 同註1。
- 4 庫德曼：《第七章：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鬥爭》，引自《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載於《馬克思主義中文文庫》：<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about-FASCISM>。
- 5 “納粹黨”，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
- 6 同上註。
- 7 轉引自江忠：《論武士道精神對日本人性格的影響——以“武士義理”為中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載於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d78c97e96294dd88d0d26b64.html>。
- 8 楊紹先：《武士道與日本現代化》，載於《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 9 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載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頁。
- 10 高文錦、王永風：《抗日戰爭時期愛國主義的特點與啟示》，載於《武警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 11 “約翰·拉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
- 12 “奧斯卡·辛德勒”，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www.baidu.com/s?ie>。
- 13 馬振犢：《侵華日軍暴行與納粹暴行比較研究初探》，載於《南京大屠殺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14 轉引自鐵血歷史論壇：http://bbs.tiexue.net/post2_3472660_1.html。
- 15 轉引自付鑫鑫：《日軍俘虜獲優待後被感化，加入八路軍英勇抗戰》，載於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6-17/7350895.shtml>。
- 16 “聯合國宣言”，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17 《人類之夢：公理與和平——“聯合國宣言”簽署70週年祭》，載於《中學歷史綫上》，2012年第3期。
- 18 習近平：《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5/c_119499523.htm。
- 19 李嘉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教育》，載於《群言》，2014年第8期。

- ²⁰ 《歷史文獻：波茨坦公告(全文)》，載於新華網：http://japan.xinhuanet.com/2015-07/26/c_134447115.htm。
- ²¹ 《國際刑警組織》，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10/content_966304.htm。
- ²² 《近十年來被引渡回國的 11 個著名外逃罪犯清單》，載於財新網：<http://www.sinoca.com/news/china/2011-07-22/153408.html>。
- ²³ 同註 19。
- ²⁴ 派翠克·曼漢姆：《諾貝爾獎得主巴黎宣言：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載於《國際先驅導報》，2003 年 1 月 17 日，第 32 期，第 3 版。